

郑观应的商战论

北京大学经济系 郑学益

郑观应是我国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盛世危言》等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和较为完整的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学说——商战论，为近代中国人民提供了直接的反帝理论武器，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作出了特殊贡献。

郑观应曾在英国宝顺公司、太古轮船公司等一些外国洋行中担任过高级买办，但是他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并不甘心做洋奴，而是逐渐地从买办商人里分化出来，成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较为突出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大声疾呼地要求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初学商战於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①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比当时其他的改良派人物如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人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他也比上述诸人都更为系统地提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论。

王韬已开始指出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有两种方式：商和兵，“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②郑观应在王韬的认识基础上作了概括和发挥，明确地提出“兵战”和“商战”两个范畴：

“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③

郑观应十分痛切地感到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两种侵略方式中，商战即经济侵略要比兵战即军事侵略更危险、更严重。因为，军事侵略是“有形之战”，容易察觉，使人们提高警惕，加强防备，组织抵抗。而经济侵略是“无形之战”，使人们掉以轻心，防不胜防，这样造成国家逐渐衰落、最终灭亡。他一再说：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④

另一方面，从侵略后果来说，军事侵略时间短暂，所带来的战争创伤比较明显，也容易治愈。而经济侵略长期持久，所造成的经济破坏是损及脏腑的内伤，经济被掠夺而破产，则国家灭亡指日可待：

“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⑤

“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

① 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盛世危言》后编，卷八。

② 王韬：《上丁中丞》。《弢园尺牋》。

③ 郑观应：《商战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二。 ④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⑤ 郑观应：《商战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二。

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①郑观应的这些卓越见解为甲午战争后成熟阶段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继承发展，谭嗣同指出西方列强“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於无形”，^②康有为的认识更有深度：“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③

二

针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的两手，郑观应深刻地认识到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仍用历史上传统的抵抗少数民族军事征服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明确主张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用两种方式进行反侵略，这样就使“兵战”和“商战”两个范畴具有了侵略和反侵略的双重含义。他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强“商战”能力，有效地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决胜于商战”。^④郑观应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侵略有着较清醒的头脑，他认为：“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⑤因此，他主张加强国防力量，改变腐朽落后的军事制度，学习西法进行操练，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精研兵法战术，通过实战演习，提高作战和指挥能力，建立一支先进的陆、海军驻守边疆和沿海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

可见，郑观应并不放松“习兵战”，只是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危险、更难对付，因此必须以“习商战”作为重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尤其可贵的，郑观应还比较透彻地分析了“兵战”与“商战”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首先，郑观应认为“兵战”与“商战”是强与富的关系。加强军事力量以“兵战”图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商战”求富。只有开展“商战”，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中国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进行“兵战”。否则，中国的军事力量将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空架子。所以他说：“国既富矣，兵奚不强”，^⑥“能富而后可以致强。”^⑦

郑观应又辩证地认为强是富的保障，“兵战”是“商战”的后盾。他指出外国的军事侵略为经济侵略服务，“矢口称黄祸，调兵保商贾”，^⑧商品倾销用大炮开路，掠夺原料用兵舰送行：

“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絜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鉴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⑨

侵略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当它们用经济手段达不到目的时，就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通过军事侵略来为经济侵略扫清障碍。因此，中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边疆，

①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② 谭嗣同：《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

③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二）。

④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⑤ 郑观应：《民团》。《盛世危言》初编，卷六。

⑥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⑦ 郑观应：《商战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二。

⑧ 郑观应：《霸王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卷二。⑨ 郑观应：《商务二》。《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巩固国防，才能有效地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顺利发展。

“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相需为用，乃能相济有成焉。”^①

其次，郑观应还认为“兵战”与“商战”是标与本的关系。他指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注重“兵战”，更要注重“商战”。“兵战”虽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末”和“标”。他批评洋务派的船坚炮利政策是“舍本图末”，尽管不断“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枝，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但仍然无法对抗外国侵略者。“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膺欲”。^②针对洋务派的“舍本图末”，郑观应提出了自己的“标本兼治”主张。他认为国势的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商战的胜败，即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否。只有在商战操胜算的基点上，才能推动兵战，使军事力量真正强大起来。他指出西方列强“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其商务者，在所必争”。^③因此，中国必须“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④

三

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在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是个商人出身的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十七岁就投身工商实业界，后来当过商办时期的粤汉铁路总经理，自己还创办了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国内一些重要口岸开过内河航运公司以及经营了其它一些工矿企业。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在郑观应的商战论中得到了更直接的反映，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也就提得比较具体和细致。在《盛世危言》自序中，他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在商战中，郑观应相当重视建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问题，强调指出：“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⑤他还从两方面论述了大机器工业的必要性。对内方面，大机器工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工商业的向前发展，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⑥对外方面，只有大机器工业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市场，与外国侵略者展开商战，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他指出西方各国的六十多种洋货“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⑦因此，他呼吁“亟宜招商集款，自行制造，擅其利权”。^⑧他还认识到中国若不发展自己的机器工业，不管自然资源如何丰富，最终都要被外国列强掠夺而去，“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⑨

郑观应对大机器工业的认识是由浅入深的。起先他比较强调在轻工业中采用机器生产，

① 郑观应：《开矿》。《盛世危言》二编，卷一。 ②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③ 郑观应：《商务》。《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④ 郑观应：《商战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二。

⑤ 郑观应：《商务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⑥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⑦⑧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⑨ 郑观应：《机器》。《盛世危言》二编，卷一。

“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购机器织呢毡绒纱、羽毛、洋衫裤、洋衫、洋伞等物……”。^①到后来，郑观应看到中国所使用的机器“仍须购自外洋”，这样仍然受到洋人的控制，“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②因此，他逐渐认识到了只有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才能在商战中保持独立，从而有效地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但知购买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即便自用，且可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③

开展商战离不开交通运输，郑观应反映了民族资本这种“物畅其流”的要求，他对铁路、火车、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十分赞赏，大加推崇：“中国富强之转机，在此一举矣”。^④他例举了铁路“有十利而无一害”，认为不但“可助国用”，而且“运费省而销路速……商贾便於贩运，贸易日旺，税饷日增”，“风气大开”。^⑤郑观应还指出外国轮船控制了中国的航运是“喧宾夺主，害不胜言”，^⑥他认为：“欲求中国富强，当论用轮船”，^⑦主张自制新式轮船，并亲自创办航运公司，“令沿海要埠，中国公司轮船日增，利不外溢，诚塞漏卮，讲富强之一大端也。”^⑧

新式工商业与矿业密切联系，郑观应从充裕财政、交通运输、燃料动力、军用民用各个方面，阐述了开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居今日而策国家之富强，资民生之利，赖固地之利，取无尽而不竭者，其惟开矿一事乎”。^⑨同时，他还列举了我国丰富矿藏的若干项目和有利条件，认为完全有可能大规模开采。

金融货币制度是顺利开展商战的前提，郑观应充分认识到银行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工具：“夫洋务之兴，莫要切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他还指出了银行对促进新式工商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濬财源，以往大局”。强调“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主张开办官、商银行，发行银行券，铸造钱币，禁止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他还抨击了英国汇丰银行“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指出这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⑩

郑观应也注意到了农业问题。他不是从民食角度看农业，而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⑪因此，他主张发展蚕桑、茶叶、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为对外贸易提供出口商品和向工业提供原料。并提出用新式农业机器和农业技术来改善经营方法，促进农业生产，“若用西国机器以之耕种，可使土膏深透，地力腾达，物类易于收成，亦当倍蓰。”^⑫

郑观应的商战范围从工矿业到农业，从交通运输到财政金融，不同程度地阐述和说明了这些部门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和建议。但是，在郑观应的商战体系中，是把商业提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

①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② 郑观应：《商务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③ 郑观应：《商务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④ 郑观应：《火车》。《盛世危言》二编，卷一。

⑤ 郑观应：《铁路》。《盛世危言》初编，卷四。 ⑥ 郑观应：《商船上》。《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⑦ 郑观应：《商船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⑧ 郑观应：《商船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⑨ 郑观应：《开矿》。《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⑩ 郑观应：《银行》。《盛世危言》初编，卷五。

⑪ 郑观应：《农功》。《盛世危言》初编，卷四。 ⑫ 郑观应：《机器》。《盛世危言》二编，卷一。

强调以商业为中心进行商战。对于发展国内民族工商业来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①对于抵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来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②我们可以把郑观应的有关论述归纳为三个层次：

先看商业部门本身，郑观应认为商“握四民之纲领”，没有商业，整个国民经济就失去了主导部门，士、农、工各行各业将无法开展正常的经济活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必须以发展商业为前提：

“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大义哉！”^③

再看其他经济部门，郑观应提出了“士农工为商助”，四民中的士农工等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不过是居于辅助地位，都是商业的助手，从属于商业发展的需要。此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国防事业也都必须围绕商业这个中心来展开活动：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④

最后，郑观应得出了“以商立国”的结论。他驳斥了地主阶级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鼓吹的“以农立国”的陈词滥调，明确提出开展商战必须“以商立国。”^⑤

郑观应的商战与王韬的“恃商为国本”。^⑥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纲”^⑦一样，都是以商业为中心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还主要是通过商品输出的形式进行，摆在中国人民的议事日程上的是怎样对付商品进口所引起的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等问题，这自然造成了郑观应等人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商务”即商品流通方面。加上当时中国新式工业还极不发达，洋务派官僚集团控制的工矿企业在全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而民族工业资本还远未长成，私人投资兴办企业还很少，这就使郑观应等人并不主要着眼于生产过程，也不可能提出以大机器工业为中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此外，思想认识过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当时中西交往时间不长，中国先进人士对西方接触还不多，一时不可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关系，这样就只能肤浅地从流通表面看问题，片面夸大了流通的作用，提出了以商业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主张。

四

郑观应的“商战”顾名思义就是商品之战、商人之战，也就是市场竞争。交战双方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是商人，他们不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而是在市场上展开角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这种竞争，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新式工商业体系作为竞争的经济基础。郑观应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工商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方。因此，他把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提了出来，主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全面发展国民经济。但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紧

① 郑观应：《商务一》。《盛世危言》三编，卷一。③ 郑观应：《商务二》。《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② 郑观应：《商务下》。《盛世危言》初编，卷三。④ 郑观应：《商战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⑤ 郑观应：《商务》。《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⑥ 王韬：《代上广州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

⑦ 薛福成：《英吉利利用商务辟荒地论》。《庸盦海外文编》，卷三。

紧捆住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手脚，清朝洋务派官僚对新式工商业实行官僚垄断政策，也给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为此，郑观应在商战论中提出了几个重要前提。

当时横亘在商战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即是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各种特权。郑观应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限和取消外国侵略势力在华的种种特权，中国在这种劣势局面下与外国进行商战，只能“徒使洋人节节制，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①因此，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提了出来。

郑观应竭力反对帝国主义在华所取得的协定关税、内河航行和筑路开矿等特权，强烈要求清朝当局加以废除。他尤其反对赫德一伙外国侵略分子把持中国海关，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赫德等人的罪行：“专司总钥为赫德，付以华员亦不许”，^②“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③他警告满清政府如果继续倚重这帮侵略分子，必然会蹈印度等国的复辙，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他大声疾呼收回海关主权，改派华人担任主要职务，“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权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④他还主张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⑤

在反对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斗争中，郑观应对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的关系，开始有了一些模糊认识。当民族资产阶级受到洋人欺压，要求得到政权的保护时，清政府“不惟不助商，反腴削之，遏抑之”。^⑥而对外国侵略者凭借特权屡生事端，胡作非为，压迫民族资本，破坏中国主权的罪行，清朝当局“遇则官长过于迁就，士民不敢抗衡，洋人习以为常，愈无顾忌”。^⑦看到清朝当权派的这一付奴颜婢膝，郑观应痛斥道：“虽日受外人欺侮，仍然驰驱杳杳，苟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知耻”。^⑧他愤慨地说：“我每曲法相就，华民之忍辱，由于畏官长，官长之曲法，由于畏朝廷”。^⑨后来，他又在一封信中，借托民谣，进一步揭露了外国列强和满清朝廷的肮脏关系：“外国动辄挟天子令诸侯制百姓，故有外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皇帝，皇帝怕外人之谚也”。^⑩虽然，郑观应还没有认识到清朝统治者已经成为西方列强在华殖民统治的工具。但是在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郑观应的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的。

洋务派官僚集团是中国商战道路上的另一只拦路虎。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以反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而洋务派却勾结洋人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官僚垄断政策。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商战，郑观应不可避免地会对洋务派的这种官僚垄断政策进行斗争。

不过，郑观应对洋务派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道路的。最初，由于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特别软弱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势力十分强大，而洋务派的反动面目又未彻底暴露，郑观应对洋务派官僚曾经抱有较大幻想，指望洋务派支持商战、成为民族资本

① 郑观应：《商务一》。《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② 郑观应：《保主权》。《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卷二。

③ 郑观应：《商务一》。《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④ 郑观应：《税则》。《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⑤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⑥ 郑观应：《商务一》。《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⑦ 郑观应：《交涉》。《盛世危言》二编，卷二。

⑧ 郑观应：《上戴少怀尚书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七。

⑨ 郑观应：《交涉》。《盛世危言》初编，卷二。

⑩ 郑观应：《致姚伯怀太守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三。

的庇护者。在洋务派开办新式企业时，他以商股代表的身份，先后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许多官督商办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且，他还积极为“官督商办”制度进行宣传鼓吹。一方面列举了单由官办或单由商办的缺点：“全恃官办则巨费难筹，……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另一方面又把“官督商办”制度描绘成最理想的企业形式：“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①他甚至曾把洋务派的官权看作进行商战的首要前提，认为：“商务之战，既应籍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籍官权为振作，……籍官本以兴创之，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②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郑观应耳闻目睹了洋务派企业内部的种种腐朽现象，吃尽了洋务派官僚“护持”的苦头，终于认识到了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是顺利开展商战的严重束缚，从而对洋务派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指责，一再揭露“官督商办”企业的黑暗内幕。

郑观应抨击洋务派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中贪污中饱、侵蚀渔利，掠夺私人资本，“赢利借事勒捐，亏则多生枝节”。^③他还揭发了洋务派官僚利用裙带、血统等关系挟私用人，培植党羽。郑观应尤其谴责了洋务派官僚“官夺商权”，在企业中，总办、帮办、坐办和提调等大小官员“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④这些人控制了企业大权，压迫民族资本，而商股代表则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动辄必为官长掣肘”。^⑤因此，郑观应积极主张让私人资本家自由投资兴办企业，“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船、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自便。”并提出新式企业的经营管理应该“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⑥

在郑观应的晚年，他怀着怨愤的心情写下了《商务叹》一诗，其中“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⑦四句，尤其击中了洋务派的要害，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的实质是压迫民族资本，阻碍商战，为外国侵略势力效劳。

在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洋务派官僚“但有困商之虐，并无护商之良法”^⑧的情况下，郑观应开始认识到封建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他从发展经济前进到改革政治，发出了开议院、设商部的呼声，为民族资产阶级争取一定的政治权利，以推动商战。

郑观应的上述政治改革要求是十分软弱无力的，他只是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有所指责，却并不想进行根本性的彻底改革。他所要求的议院还是一种咨询机构，并无立法权，他的设商部也仅仅是希望清朝自上而下的恩赐，使资产阶级获得某些参政权利。但是，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闷空气里，郑观应的这些政治改革要求毕竟起着开通风气的作用。并且，对以后的康有为等人提出“全变”的主张，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先导。

(本刊收到稿件时间：1982年5月)

① 郑观应：《开矿》，《盛世危言》初编，卷五。

②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③ 郑观应：《船政》，《盛世危言》二编，卷一。④⑥ 郑观应：《商务二》，《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⑤ 郑观应：《开矿》，《盛世危言》三编，卷二。⑦ 郑观应：《商务叹》，《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卷二。

⑧ 郑观应：《商务二》，《盛世危言》三编，卷一。